

团圆牵线人卢海淦：

寻亲九载，他帮阿公阿嬷梦归潮汕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鄢敏 图/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张瑞柠

今年9月25日，中秋节的一大早，马来西亚侨胞郑金慧接连收到喜讯：舅公蔡速林、蔡喜林和叔公郑锡奎都找到了！断联几十年的情缘在万家团圆之际续上了。

成功寻亲背后，有一个人功不可没：潮州市归潮寻亲志愿者协会副会长卢海淦。中秋节的前一天，他把两封“阿嬷的情书”制作成视频发布在社交平台。不到24小时，卢海淦便收到了线索，经核实为寻亲对象。

不只这一宗海外寻亲，过去9年来，卢海淦和队友们无偿为潮汕人寻亲，累计接到4000多例求助，成功帮助1200多个家庭团圆。今年5月，随着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热映，越来越多海外侨胞联系卢海淦，希望寻找自己的亲人。

审计专业出身的卢海淦，怎样走上漫漫寻亲路？这些年，他如何帮素不相识的潮汕人寻找宗亲？为什么能坚持下来？回答这些问题，首先要从一家咖啡店说起——



卢海淦

跟时间赛跑

广东潮州，文星路4号，一幢明黄色骑楼静静伫立，门口悬挂的牌子写着：人才咖啡。顾客一进店，大厅左侧整面墙的侨批图首先映入眼帘。上百个海外潮团会标、下南洋路线……随处可见的侨文化印记，让这家咖啡店别有一番风味。事实上，它还有个特殊功能：“梦归潮汕”寻亲团固定联络点。

咖啡与寻亲，如此混搭的组合，始于一次偶然的善意。

2017年，卢海淦回乡创业，在潮州古城经营“人才咖啡”店。次年，公益组织“梦归潮汕”找到他，希望借咖啡店开展活动。原来，该团队自2016年起义务帮潮汕人寻根，一直想找个地方，方便老人家坐下来聊天、采集信息。卢海淦当即应承下来，“几乎没有思考，我就说，‘可以，我很支持’。”他年轻时曾到马来西亚留学，一开始不会讲英文，举目无亲，“对家乡的思念很难用言语表达，只能说刻骨铭心。”所以，游子渴望寻根问祖的心情，卢海淦感同身受。

因为一句承诺，“人才咖啡”店招旁，多了一块“归潮寻亲”的牌子。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——

坐在红砖绿瓷间，卢海淦接待了一位又一位寻亲人。他们大多来自福建、江西等地，在1939年至1943年因战



卢海淦(右)与村中宗族长辈沟通

乱、饥荒被迫逃离潮汕。时过境迁，这些年逾古稀的老人思念故土，拿着一个地名、一封旧信苦苦寻觅。望着他们苍老的面容，听着一段段前尘往事，卢海淦倍受触动，“好像自然而然地进入志愿者的角色”。

原本悠闲自在的咖啡店主，一下子忙起来，整日不停地在外奔波：记录寻亲信息、走访村落祠堂、联系宗族长辈。“寻亲人年纪非常大，没办法等。”所以，卢海淦和队友们一接到求助，马上就行动，“有多少找多少，我们是在跟时间赛跑”。

由此，卢海淦的生活重心悄然转移。以至于，他每天到咖啡店，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查业绩，而是登录“梦归潮汕”账号，看后台有没有人留言。

不走捷径的寻亲路

“泰国赵荣坤后代寻潮阳”“赵”姓族亲”“马来西亚郭逢潮后代寻潮安”“郭”氏亲人”……最近几个月，卢海淦频繁收到海外侨胞求助，“多的时候，一天有三四宗，爆单了”。

随着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热映，潮汕地区迎来跨国寻根潮。卢海淦的咖啡店位于景区，“有些旅客路过看到牌子，会直接进店咨询。”比如，举家出游的新加坡侨胞吴玉娣，今年5月，她携父母持1993年旧信到店求助。但吴玉娣

万万没想到，仅凭几个模糊地名，卢海淦和队友们跨城排查，只花四天就找到了三门断联数十年的族亲。“如果没有这群志愿者，肯定找不到我们的根脉。”吴玉娣哽咽着说。

“登记信息后，我们一遍遍检索、比对。”卢海淦复盘，吴玉娣父亲年事已高，说不准老家村名，只有墓碑照片上“沟边村”三个字清晰可辨。再加上三个家族分散在汕头、潮州等不同地方，他们兵分多路扎进村子里，跑了数个老旧小区、爬了很多趟楼梯，向多位长辈求证。

明明发个短信、打通电话就能搞定的事，为什么如此大费周章？“不能听到相似就直接承认，万一是一同音别字，搞乌龙就糟糕了。”卢海淦强调，寻亲不能依赖网络消息，必须审慎甄别，容不得半点马虎。

秉持严谨求实的原则，这些年他们不走捷径，“笨拙”地前行：翻山越岭，找一口干涸的古井；翻阅族谱，拼一个模糊的乳名。即使遇到高度疑似对象，卢海淦也没有降低标准，“对求助者负责，志愿者一定要到场”。

“不会放弃”

8月末，一个骄阳似火的午后，卢海淦和队友再次进村走访，为新加坡侨胞陈惠珊寻找曾祖父的故乡。“连续两个人爆料，都指向凤塘镇的一户人家，成功率应该有九成。”出发前，卢海淦信心满满。

途中，卢海淦拿着一张手绘的家谱图，同队友推理分析：已知其祖父陈学明是1928年生，家族长辈碑文照片显示“广东省潮安县下塘大和都”，往前追溯其曾祖父大概率在清朝末期从潮安到新加坡过番；由于长辈已过世，早年便与家乡断联，没有留下更多资料；目前掌握线索潮安区凤塘镇旧称“下塘”，一本族谱上出现了“陈学明”的名字，现在要核实两位“陈学明”是否为同一人。

“像是在‘破案’。”卢海淦透露，族谱图看起来简单，每条信息都是一点一点挖出来的，包括出生年份、多少个孩子、结过几次婚，等等。“要花好几天，才能梳理清楚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家族史。”卢海淦感叹，这个过程仿佛经历了一代人的悲欢离合。

来到东门村的四房宗祠，几位长辈

拿出新修的族谱，他们和卢海淦一同围在桌子上，逐字比照人名，不时“激烈”讨论，并询问一位阿公。“只有老人才知道过去的事”，卢海淦敏锐地捕捉到一条关键线索，随即发消息向求助者反馈，不厌其烦地求证。那一刻，卢海淦宛若一座桥，连接起海内外的潮汕乡亲。

遗憾的是，来来回回沟通了两个多小时，卢海淦无功而返。“跑一次不成功的情况经常发生，不可能百发百中。”他和队友们习惯了“扑空”，淡然一笑排解失落情绪，留下一句：无论机会多渺茫，都不会放弃。

他们盼了一辈子

助人寻亲这条路，卢海淦一走就是9年，从未计较自己付出了多少。“没办法算，也不用算，就是凭个心。”每每目睹久别重逢的感人场面，高兴之余，卢海淦都会愈发坚定继续找下去的决心。“虽然隔了很久，也隔了很久，他们还是想要找到自己的根。”他始终记得——

庐岗镇溪尾村周氏后人说：“每个月28号，伯父都会寄100元港币回来。我们一直盼着新加坡的亲戚能找回来，盼了一辈子……”

逃难的孩童，年过古稀时找到失散亲人，双方抱头痛哭，抒发积攒几十年的思念之情。“大家都跟着哭，多少话都显得苍白。”

海外第三、四代侨胞，欢欣鼓舞地回到祠堂认祖归宗，同相认的亲友坐下来喝一杯茶、吃一顿饭。“跨越两个国家，让失联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家庭重新连接上，非常有意义。”

最近，为了提高寻亲成功率，卢海淦试水短视频寻亲，“只靠文字散播信息已经不够用，寻亲也得不断创新。”于是，他在49岁这一年，开始自学视频剪辑，从零起步摸索着加字幕、放图片、配音乐，一帧一帧把收集整理的寻亲信息转化为十秒左右的短视频。眼看着视频浏览量从几百、几千涨到几万、十几万，每增长一点，卢海淦都觉得多了一分希望。

夜晚，皓月当空。卢海淦坐在“人才咖啡”店，不禁想起那几位始终没找到故居的老人：廖金妹、陈秀香、杨雨金。他念明着，过几天还是要再去找找，“说不定这一次就成了”。

“棘手的病人，能救下一个是一个”

小儿神外医生张旺明和他的“脑瘤娃娃”们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张华 图/受访者提供

今年8月，一个孩子自己走进了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的病房，来找张旺明复诊。难以想象，一年多前孩子被送到这里时，他的磁共振片子上“满脑子都是肿瘤”；家长跑了好几家医院，听到的都是同一句话：别治了。

十二年前，张旺明从成人神经外科转到小儿神经外科，接下了许多医生不愿接的孩子。从一台总也做不成的磁共振检查，到八个学科围着一张病床转，他和同事们一步一步，蹚出了一条很多医院都走不通的路。

折腾五趟，没做成一次检查

2026年8月，一个周二下午，珠江医院影像科磁共振室的节奏跟往常不太一样。一群小患者被集中安排在这个专场。他们有的被家长抱着，有的躺在转运床上，接下来都要做头颅磁共振检查，而且孩子必须纹丝不动。

放在几年前，这是小儿神经外科主任张旺明最头疼的事。

“孩子做头颅磁共振检查，通常都不合作。医生给孩子服用常规剂量的镇静药，但对部分人就是不管用。”张旺明回忆，“患儿做磁共振检查很折腾，家长难受，磁共振室的工作人员也难受。一个上午那么多病人排着队，这孩子刚睡着一躺上去就开始动了，只能重新来过，耽误了别的患儿，影像科意见很大。”

最极端的一次，一个孩子折腾了五趟，没做成一次检查。更早的时候，医生想出来的解决办法是把孩子送到别的医院——那边有麻醉医生负责镇静，但一次收费8000元。而在珠江医院，同样的操作只收300元，价差悬殊，很多家长并不愿意。



张旺明(左二)和团队在对患者开展脑部手术

最后靠医院层面协调，每周二固定为小儿磁共振专场，麻醉科派专人到场，根据不同孩子的情况，或滴鼻或静脉给药，一人一方案。这看似微小的变化，成了整个儿童脑肿瘤诊疗闭环的第一块基石。现在每周二，至少十个患儿能顺畅完成检查。

从“谁也不愿意接”到“有人兜底”

2014年，张旺明做了一个让同行有些不理解的决定——从成人神经外科转向小儿神经外科。

当时的情况是，儿童脑肿瘤手术难度大、风险高，每一例都是一人一方案，不像某些先天性疾病有固定手术。而且“家长要求高，特别焦虑，期望值又高，很多又是恶性肿瘤，神经外科医生大多也不愿意接”。

破局的底气，来自珠江医院一个少见的优势：儿科中心和神经外科中心都是国家临床重点专科，两个“国重”在手。在这个基础上，小儿神经外科、儿童重症医学科(PICU)、放疗科、化疗科、影像科、病理科被拧成一股绳。“我们围

绕着儿童脑肿瘤展开自己的专长，中间缺少了任何一环，这个诊疗都很难开展。”张旺明说。

PICU主任陶少华是那个“兜底”的人。张旺明坦言：“有PICU给我兜底，我才敢放手做高难度的手术。”现在随时去陶少华的病房，至少有五六个人是脑肿瘤术后的孩子。手术一做完，病人直接进入PICU，无缝衔接。手术台上的胆量，有一部分是身后的人给的。

放疗科张俊德教授主攻儿童脑肿瘤精准放疗，小儿血液科杨丽华教授负责化疗方案制定，病理科王瑜教授专攻分子病理分型，影像科温志波教授负责术前评估和术后随访判读。

如今，每周一下午4点半，儿童脑肿瘤专病中心有雷打不动的多学科诊疗讨论会。疑难病例被摆上桌面，八个学科的专家围绕一张病床转。诊疗形成了闭环，患儿在珠江医院就能走完全部治疗，不用再被“送出去”。

被劝“别治了”之后

在儿童脑肿瘤专病中心，见得最多的就是髓母细胞瘤、脑胶质瘤等，很多人此前听都没听说过。

去年3月份，一个5岁的孩子来到珠江医院，当时情况已经糟到不能再糟。张旺明说，外院确诊其为髓母细胞瘤，分子分型是SHH激活型伴TP53突变——这是预后最差的极高危亚型之一。他指着电脑上的磁共振片子给记者看，“满脑子都是肿瘤”，已经广泛种植转移。“家长当场就崩溃了，来我这里的时候，说看了很多医院，医生都说，别治了。”张旺明说。

但珠江医院没有把孩子推出去。张旺明说，一定要给治疗方案，因为要给孩子解决痛苦。“第一步，解决脑积水——孩子头痛呕吐，颅内压太高撑不住。第二步，找一个最安全的位置取一小块肿瘤出来化验，确诊分型。第三步，化疗先把肿瘤压一压，紧接着全脑全脊髓放疗。”

“一个月，十个疗程，21天一个周期，我们跟孩子和家一起努力，今年8月复诊，孩子是自己走进病房来我这里。检查结果显示，颅内的肿瘤完全消失了，孩子的精神状态挺好，家长特别开心。”张旺明说。

记者问他是否想过这么好的效果，他摇头：“没有。但我们一定要把方案交给他。棘手的病人，能救下一个是一个。”

儿童的优势：半个脑袋也能“重塑”

采访当天，张旺明主刀完成了一台胶质瘤切除手术。两岁的孩子，肿瘤占了大脑的三分之一，“半个脑袋都是肿瘤”。切完第二天，孩子醒了。

“其实，越小的孩子，恢复能力越好，因为大脑还在发育，重塑能力强。”张旺明说，“有的患者切了半个大脑，右边可以代偿左边，照样能正常生活。”

这给了医生和家长一个不同于成人的治疗逻辑。成人要考虑生活质量权衡取舍，而父母对孩子的要求往往更简单

——“能长大成人，哪怕有点残疾也能接受”。而孩子的康复主动性又远超成人，功能恢复得比成人快得多。

据统计，目前珠江医院儿童脑肿瘤中心的累计手术量接近600例。髓母细胞瘤等常见恶性儿童脑肿瘤，5年生存率已达70%以上。张旺明介绍，儿童脑胶质瘤和髓母细胞瘤是后颅窝最常见的肿瘤，“手术关已经非常成熟，切完了再配合化疗，现在可以说达到国际水平”。

治不好的病，要把话讲透

如今，科室病房常年满床。不少患儿家庭辗转多家医院，有的已在外院敲定手术方案，做完备皮，又连夜转了过来。

据记者了解，珠江医院儿童脑肿瘤专病中心小儿神经外科现有13名医生，每天都在排手术，今年上半年已完成一百多例。但张旺明并不轻松，“很多病人以为，到了医院就进了保险箱，生病肯定都能治好”。他说，现在技术进步了，治疗方案多了，反而形成新的不平衡——不但要疗效，还要省钱，还要选最合适的药和耗材。“你选好的，最后花钱多；你选一般的，又怕效果不好。”

更难的是一些没有治愈希望的病，比如弥漫性中线胶质瘤H3K27改变型。他说，目前仍缺乏公认的根治手段，“常规手术做不了，放化疗只能短时间控制，疾病很快进展。”面对这类患儿家长，张旺明只能把话讲透。医生能给的，有时是一台手术，有时只是一句不绕弯子的真话。

“我们无法保证治愈所有患儿，但只要有一丝生机，我们就会全力以赴、量身定制最优方案。”张旺明说。

现在，每周二下午，磁共振室依旧是孩子们的专场；每周一下午4点半，八个学科的医生照旧围着病例坐下来。家长们盼着，孩子也能像去年春天那个5岁的孩子一样，后来能自己走回来复诊。

羊城晚报

A5

漫读周末

· 人间

2026年10月24日
星期六

责编 杨 帅
美编 陈 炜
校对 黄文波

有本版新闻线索
请扫码加群爆料



二维码有效期
至10月30日